

如果某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人性的疏懶，那麼，如何克服這種集體疏懶當是我們最重要的共同議題。當這類集體疏懶獲得紓解，身處現實世界和網路世界交錯地帶的我們，仍然可以從現實世界裏獲得暴露在多樣資訊意見下的機會，不會狹隘地受限於網路所傳達的訊息或意見。

的明證。其實，森斯坦的觀察心得也有過度悲觀而過早觸及政府管制必要性之嫌。或許，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於環繞在我們周圍——不管是在網路上，或者是在網路外的實體世界裏——的芸芸眾生，是否具有足夠的民主素養，得以認知到公共論壇和公共議題的重要性。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如何透過教育機制強化社會大眾對公共議題的認知和關切，應該是首要問題，否則再多的政府管制措施都是無的之矢；如果，某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人性的疏懶——因為對公共領域欠缺興趣和關懷，因而懶於甚至拒絕接收不同於己的資訊和意見——那麼，如何克服這種集體疏懶，當是我們最重要的共

同議題。當這類集體疏懶獲得系統性的紓解時，只要現實世界的資訊和意見流通管道不受到系統性的過濾或扭曲，日常生活依舊身處現實世界和網路世界交錯地帶的我們，仍然可以從現實世界裏獲得暴露在多樣資訊意見下的機會，不會狹隘地受限於網路所傳達的訊息或意見。同樣地，關切公共議題的我們在流連網路時所抱持的開放態度和好奇心，也應該會自然引導我們不斷增加瀏覽網路時和他類資訊、意見相遇的機率。在這樣的思考下，森斯坦針對變化快速的網際網路世界討論，針對言論流通方式進行管制以維護民主共和國言論自由傳統的建議，可能就不免失諸過度焦慮和急躁了。

問題批判與價值重建

● 楊俊薈



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時下大陸學界風行文化研究，這既是上一世紀餘音不消的文化熱的延續，也是理論話語的再度更新。坊間標明此題的出版物出得多、售得急，原因在於無論學人還是讀者，都希圖盡快捕捉到文化轉向之後的新趨勢，然而，細檢之後

才發現其中大多隱藏三個癥結：其一，迎合日益泛濫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娛樂文化，在範式更新的旗號下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本身「大眾文化化」；其二，以研究對象的轉變為根本範型轉變，羅列現象變化，迴避深層疑問，在平面化的描述中失卻價值維度；其三，屈從全球化風潮，在文化後殖民的弱勢狀態下淡忘本土文化特性，諱言重建民族文化的主題。由此而來的疑問就是，難道此次學界熱點又是一次跟風追潮，在大規模術語挪移中遮蔽真正的中國問題？然而在閱讀了《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之後，卻發現了國內學界話語轉型的新特點和文化研究新範式確立的可能。

此書以「文化研究」的思維範式為出發點，從公共空間和個體倫理入手，將現代性和後現代性視作當代「文化鏡像」，在「全球鏡像」中看「中國鏡像」，審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觀，關心各種主義掩蓋下的真實問題，反思問題產生的前因與後果。同時注意文化思想問題的學術史清理，考察世紀末的人心人性，透視時代的喧囂浮躁，總結世紀之交的關鍵性問題。

書中談及的關鍵問題包括：漢語知識界在共識破碎以後的話語論戰局面；保守、激進與自由主義三維之間的運動軌迹；知識份子學術／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傳媒之間的位置偏移和重新定位；「後學」問題（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氛圍）在學術圈內的發生與衍變等。在「後學」論爭一章中，書中透析了十餘年間百十來人的近千篇文章著作，雖然簡要卻依然全面地展示了東方主

義和西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交鋒與交織，提出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形象解讀和文化身份再識問題，述明何以必須在跨文化對話的前提下，進行現代性反思和價值重建，整合本土性與全球性，推進自身現代化。在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解析中，可以看到此書在習見的「閱讀中國」、「闡釋中國」之外的「感知中國」、「理解中國」的意緒與追求。此後，該書視線又凝聚在與個體精神相關的文藝問題上，辨析了新歷史主義對於中國當代問題史的滲透，注意到少數話語言說方式的意義，關注先鋒藝術實驗的困境、詩歌精神的降解和批評的失序、失語、失衡。貫穿其中的思考前提是，要「在中心文化和邊緣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所構成的張力場中，為現代人的生存選擇和文化身份加以價值定位」（頁18）。

在大眾文化盛行，傳統價值失效的現實境況中，《中國鏡像》不趨同喝彩，也不斷然否棄，而是在關照中尋覓隱匿其中的現世人們的情感方式，體察包含在事實與意義之中的真實情緒流向，試圖以清明的理性、清晰的說理、清純的心境和清正的心性去把握批評的距離，堅持批判的本位和批評的公正，對於一切消弭深度、媚俗從眾的無思、無品、無格的偽學術、偽藝術加以整體的拒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批評的鋒芒掃過文化的駁雜色彩時，並不意味着就此懸擱了價值判斷。書中採用的現象學方法有助於避免偏頗先見的介入，卻不會傷及文化重建的建構性思維。在“.com”時代的狂歡聲中，該書卻堅持強調

在大眾文化盛行，傳統價值失效的現實境況中，《中國鏡像》不趨同喝彩，也不斷然否棄，堅持批判的本位和批評的公正，對於一切消弭深度、媚俗從眾的無思、無品、無格的偽學術、偽藝術加以整體的拒絕。

當下中國的啟蒙問題經歷了複雜的變化，知識份子的啟蒙首先得從自我清場開始。從「審父」到「審己」，不再居高臨下地耳提面命，而是在有益他人的言說實踐中使人明白、體悟、接受和轉變。由此確立起來的「新價值」就是對於張揚「新理想」和「新啟蒙」的訴求。

心性價值的深度模式。在評析90年代漢語詩歌信仰坍塌後的歧路彷徨時，書中並不贊同迅速背轉詩性精神的逃逸舉動，反對着意消解詩意存在的白話式的口語詩作，倡揚直面虛無的知識份子寫作氣質，希望漢語寫作能夠走出源於生命根底的內在危機，清理民族的、個人的「歷史與記憶」，從「生命的刀鋒」走向「思想的大道」（頁253）。

相對於80年代激昂澎湃的文化論述而言，《中國鏡像》一書顯得不無低調，但是這不能被視為後現代語境中普遍放棄價值關懷的表現，因為當下中國的啟蒙問題經歷了複雜的變化，知識份子的啟蒙首先得從自我清場開始。從「審父」到「審己」，關注傳統文化的當下意義和民眾心理的真實變更，將價值關懷轉而體現在回歸自我的清場行為和對個體自身剛健浩然的品格建構上，不再居高臨下地耳提面命，而是在有益他人的言說實踐中使人明白、體悟、接受和轉變。由此確立起來的「新價值」就是對於張揚「新理想」和「新啟蒙」的訴求。所謂新理想是在舊理想主義失敗、思想困倦之時對理想精神的全新籲請。新啟蒙則是「無止境的心靈解蔽過程」，首先是整體精神的，對每個個體心靈的自我啟蒙，除去虛妄張狂而認清自我，知悉自我存在有限性和可能性，洞察自我選擇的不可逆性與自我承擔選擇的結果，不去營造包羅萬象的永恆體系，而是將它化作一種生命態度、人文氣質和哲思生活，「在自我精神覺醒之後，學會真誠傾聽，寬容對己待人，追問言說與寫作的意義，使自己的存在成為

社會的微量元素，具有批判性、前瞻性和示警性」（頁111）。

這種理性態度與作者本人的立場定位不無關聯。如果說書中的尖銳批判顯示了精英文化立場，急切的價值訴求顯示了終極關懷的取向，那麼，平實可信的言說風範和拒絕遊戲的沉思品性正體現着這一代學人的自我定位，亦即，「不以世俗化的、語言遊戲的甚至是權力運作的態度去看問題，強調向內挖掘獲得自我新生，在增加文化資本或更新知識結構的基礎上建構自己的思想地基」。此外，該書的寫作在意識形態壁壘中力圖真實地描繪出複雜多變的文化地形圖，辨明交錯其中的多方話語以及話語後的權力機制。在此，作者採取了邊緣化立場，既反抗與權力話語包括商品權力話語的共謀關係，審理西方文化霸權話語，接受方法論層面的、警惕作為本體論的或兼併論的、甚至是文化擠壓的話語霸權，同時對漢語學界知識話語之間的論爭以及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西化傾向與文化保守傾向保持價值判斷，以避免價值偏離，並以此衝破多重壁障，既不固步自封於無變化的傳統，又不迎合文化強勢，同時警惕流俗文化的侵襲，始終保持着開放型對話。由此使得這本書的工作平台得以建立在與西方話語的平等對話上，放眼世界學術前沿，把凸現於90年代的中國文化問題看作是與國際學術齊平或準齊平的值得研究和追問的問題，擺脫西方話語霸權的壓力，彰顯本土研究實力，參與而不是模仿，對話而不再複述，立足中國問題的實情與特性，而非尋找

與西方文化現象的疊合。面對時下備受關注的媒體傳播問題時，該書在博德利亞 (Jean Baudrillard)、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等人的論述之後繼續推進，闡釋第三世界媒體所必須具有的「反霸權空間」意識，對多元價值中的媒體神話加以深省。

就像中國文化精神往何處去是每一個不曾忘卻歷史創傷的知識份子都嘗試求解的難題一樣，所有論述中國文化的著作都無法迴避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再鑄民族精神的問題。《中國鏡像》同樣處在後現、後殖語境裏為中國文化進行定位和為新世紀中國文化爭

得話語權的焦慮中。如何對傳統文化進行轉型性創造和批判性重建，如何引進話語機制，啟動母語文化的僵化狀態並防止東方文化精神的失落，如何在科技神話、現代化神話、經濟金錢神話中、在西化和跨國資本的參與中、在權力對經濟的介入中設立合理可行的預定目標，都是該書的憂懷所在，需要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和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的二元對立中審慎考慮。然而，「一種注重『社會資本』的具有文化精神信仰底蘊的『價值文化』」(頁396)，正在《中國鏡像》折射出的心性光輝中漸生漸長。

就像中國文化精神往何處去是每一個不曾忘卻歷史創傷的知識份子都嘗試求解的難題一樣，所有論述中國文化的著作都無法迴避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再鑄民族精神的問題。《中國鏡像》同樣處在後現代、後殖民語境裏為中國文化進行定位和為新世紀中國文化爭得話語權的焦慮中。

體制內的革命

● 淮 茗



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1905年成立的學部雖然是個短命衙門，僅僅六年時間就隨着滿清王朝的退場而成為歷史陳迹，但是它的出現卻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無論是其表面的象徵意義還是其內在的歷史意蘊，說它是打開晚清政治、教育、文化之門的一把